

株洲风物

从“茶陵铁犀”到“茶陵牛”

王薛刚

外人夸赞茶陵人,谓其勤劳、勇敢、憨厚、倔强,总不忘加个“茶陵牛”的比喻。

“茶陵牛”三字,尊崇有之,戏谑调侃亦有之,要追究其渊源来历,不但外人难以解释清楚,即连茶陵本地人,也多不晓其因果,或谓其与古城墙下的那尊铁犀有关,也多语焉不详。

那么,“茶陵牛”这一茶陵人的精神图腾到底因何而来呢?又是否真与城墙下的铁犀有关呢?

“茶陵铁犀”的来历

外地人提起茶陵,除了古城墙之外,第一印象便是卧于城墙下的那尊“南浦铁犀”。

茶陵地方文献载:南宋“绍定改元,明年(1228年)秋,余公(指时为湖南管军政、民政官员余嵘)来,适逢其冲,寇(指郴桂一带苗民起义)既入,余(今炎陵县)欲向兹邑。公命幕属督兵御之,卒不能犯。但余视察茶陵城防,发现“堞墙(指残破不堪的金州城,位今思聪城门村)既夷,荡无闾闾”,说“其地大以要,孰如茶陵?”最后责问:“盖议城之?”为什么不商议下修筑城池呢?

“越二年(1230年),稽诸公储,因节约之余”,就要求茶陵当局,“亟白于朝,请兴”。“是后,谓今幕僚赵君希程,详练有谋,宜相方绳址,会乃用度。谓邑令刘君子迈,强敏有志,宜鸠工课筑”。其要求是“期以坚壮,乃于农隙试事”(时任荆湖南路属郡丞刘用行《筑城记》,为“绍定(五年)壬辰(1332年)八月记”)。但绍定四年(1231年),春节后“试事”,“城之东南枕江(“江”,洣江),水冲荡,不能城”,被迫停工。而刘子迈毕竟“强敏有志”,经深思熟虑后,“括铁数千斤,铸为犀,置江岸,以杀水势。乃列木石其下,而土其上,城乃成”(《茶陵州志》,明嘉靖四年版,撰修者为大学士张治)。

张治作为首修存刻本州志,是为事过二百九十余年后的一种追记。对“铸为犀”之“犀”命名,在后,记“循良”,“形胜”篇中为“铁犀”。在所绘城之示意图上,画其状,标上“铁牛”,于是出现一物而名二。这是茶陵地方史上唯一记述其来历的。

“犀”,“哺乳动物,外形略像牛,颈短,四肢粗大,鼻子上有一角或两个角。皮粗而厚,微黑,没有毛。生活在亚洲和非洲的热带森林里,吃植物。通称‘犀牛’。”“牛”,“哺乳动物,反刍类,身体大,肢端有蹄,头上长有一对角,尾巴尖端有长毛。力气大,供役使。……我国常见有黄牛、水牛、牦牛等”(《现代汉语词典》)。两者对比,其主要区别在于角长的位置,故茶陵这一文物为似犀又似牛之怪兽。“犀”与“牛”前以其质——“铁”限之,从文化角度而言,“铁犀”为“雅文化”,在上层统治集团和知识分子中流行,又称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铁牛”,属“俗文化”,在百姓中流行,又称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和下层文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国文化地理概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二版)。茶陵地方文化工作者多说,前者为“官方称”,后者为“民间称”,直至今日广大百姓仍俗称“铁牛”,连伟大领袖毛主席“与龙开富将军回忆往事时说:‘茶陵的同志很勇敢,很会打仗,茶陵牛嘛!’”

“茶陵牛”缘于“茶陵铁犀”

把茶陵人喻作“茶陵牛”是在“南宋古城”之筑中,见刘子迈与茶陵人都具一股犟劲,即在原本“不能城”的地方,硬让其“城乃成”,且保留至今,成为“古代茶陵城地经典之作”(《茶陵古城》,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7年版)。

“不能城”是“水冲荡”,洣水自城南滚滚而来,加之城南之上游,又系来自马江地区的文水,经洣江书院大门前经过后,与洣水合流,形成其势凶猛的“冲荡”之水,“冲”至城东受阻于石质的虎形山,逼其折东,又绕北奔流而去。整个洣水至城南经一来,一折、一绕,形成绕城环流,仅城西为陆地,经护城河、沟通南北,形成环流水。正是“详练有谋”的赵希程瞄准的有险可据守之地。而刘子迈的“强敏有志”,其中“强”也如同“犟”,他又熟谙茶陵人的犟劲,就铸犀以鼓舞——古代治水,本有利用犀鼻子上一角疏通河道。禹治水,吸取其父鲧的“堵”而被杀的教训,改用“疏”,已成神。故《中华古今注》有“禹以饬河患,贾至有《铁牛颂》”之说。在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信神为真。刘子迈用其来鼓舞,则进一步训练、提升茶陵人的“犟”。其方法是“乃列木石其下,而土其上”,实则仍采用了古代劳动人民筑水坝中创造的打桩法,在“水冲荡”的河水边缘一列列地打桩,再在一列列木桩间垒砌卵石,固其石为河岸,也就形成了墙基,再采用劳动者早已探索过的夯筑法,夯筑泥土城墙。在小农经济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全靠手工劳作解决衣食住行之事。像筑城这样浩大的工程,也主要是靠夯、锄头、扁担和土箕来完成。刘用行只字未提“犀”,而描写工地场面是:“众工云兴,万杵纷如,挺土攻石,竭蹶以趣”(视苦为乐),只有憨厚而又犟劲的人才独有所具。

对“城乃成”的城防点评,刘用行和张治都是从“城”、“官”、“民”三者关系中谁更重要并加以详细的剖析后才得出结论:刘用行的是:“传不云乎,众志成城”;张治则引用“众志成城”后还补一句:“言民之依也”。“传”,为注释或解释经义的文字;“众志成城”,《辞源》释义:“谓心齐力大”。两位可以说都是运用了哲理透过现象来揭示本质,回答了“城乃成”根源于一种精神,也就是“茶陵精神”,若赋予茶陵人则可概之为:茶陵人,人心齐,力量大,且可依。

“茶陵牛”所具有的“茶陵精神”正是茶陵古城的“根和魂”。



卧于茶陵古城墙下的“南浦铁犀”



秋瑾(资料图)

株洲往事

「鉴湖女侠」秋瑾的大冲往事

李文峰

“槐庭”,自然是种植了槐树的庭院,还有春兰、夏荷、秋菊、冬梅等,满庭芳菲,皆被秋瑾入诗以寄志。秋瑾与“槐庭”的渊源,要从一桩并不美满的父母包办婚姻说起。

1894年,17岁的秋瑾随父秋寿南赴湘乡任职来到湖南。秋寿南上任后,结识了曾国藩的长孙曾广钧。曾广钧介绍,湘乡豪富王殿臣也结识了秋寿南,并得见秋瑾丰貌英美,欲娶为儿媳。为躲战乱,王殿臣在一个叫老虎塘的地方(即今株洲市石峰区大冲村)兴建华丽别墅——“大冲别墅”。当时老虎塘归湘潭县昭阳乡管,这里九郎山与二郎山、昭山连绵起伏,成为老虎塘的屏障。

1895年夏秋间,别墅建成,是一所三重院落,建筑风格集湘东民居与徽派于一体,青砖青瓦,

7月15日,难得闲暇,我们一行人驱车直往石峰区清水塘街道大冲村驶去,这个九郎山脚下被绿树掩映的小村庄,在百多年前的风云激荡岁月里,走出了一位闻名全国的抗清女勇士。当天,是她英勇就义112周年的纪念日。

女勇士是秋瑾,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志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著名女诗人;九郎山下复原的故居是秋瑾当年和丈夫居住的乡下别墅,当年名叫“大冲别墅”,秋瑾取名“槐庭”,门楼上还悬挂着秋瑾手书“槐庭”匾额。

花落“槐庭”枉凝眉

飞檐翘角。第一进为门楼;第二进为主楼,分前后两栋,每栋有两层楼房,主楼两边是谷仓等平房;第三进为厨房等。三重院落由青砖风火墙围起来,大小房屋多达13栋148间,视野开阔,远山如黛,犹如庄园。

“大冲别墅”竣工时,经媒人说合,秋家将秋瑾许配给王殿臣季子王廷钧。王廷钧比秋瑾还小2岁,当时就读岳麓书院,但并无功名。对这“门当户对”的婚姻,秋瑾自始“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当时,秋瑾居湘近两年,她辗转长沙、常德、湘潭等地,行吟屈原祠、贾傅宅、定王台等处,立下了“他年书勒燕然石,应有风云绕笔来”的报国宏愿。

1896年5月17日,秋瑾与“琴瑟异趣”的王廷钧结婚,来到“大冲别墅”生活。

梦萦“槐庭”谁赏音

笔书写的对联:“文字窥三极,湖山拥百城”。世人眼中刚刚女子其实也有柔情一面:夫妻二人举杯唱和,一个拨动古筝,一个朗声吟哦,秋瑾的目光不时透过明亮的窗棂,飞向天井之外蓝天下的槐庭,美丽的花儿幸福绽放……真是应了画上对联里“千里荷花开世界,一杯美酒对湖山”的意境。

“千里荷花开世界,一杯美酒对湖山”,上联为唐代诗人王湾诗句,下联为宋代诗人王庭珪诗句。秋瑾每每感慨王庭珪对国家的忧患和对民生疾苦的关注,爱国情感油然而生。

史料记载,秋瑾“伉俪甚不相得”,而王家是一个旧式的大家庭,充满了浓厚的封建思想,尤其以婆婆屈氏,性情暴躁,御下极严。”

走出秋瑾居室,讲解员介绍,秋瑾在“槐庭”前后生活了七八年,但深受封建婚姻制度戕害和封建礼教专制束缚,她愤然写下“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深闺莫奈何”,感叹“世俗惟趋利,人是谁赏音”。

身在“槐庭”忧天下

“槐庭”赴浏阳看望李闰。李闰深为感动,将谭嗣同的一些诗词、信札和《仁学》抄本交给秋瑾保存。

“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保祖国”。在戊戌变法失败和义和团运动影响下,湖南的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给秋瑾极大启迪;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生存,挽救祖国危亡,先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湖南每年负担赔款70万两。秋瑾悲愤不已,在《宝刀歌》中沉痛写道:“几番回首望华星,亡国悲歌泪涕多。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

这年11月,秋瑾父亲秋寿南不幸于湖南桂阳知州任上病逝。自此,秋家衰落,秋瑾在王家更受冷遇。家愁国恨涌上心头,秋瑾赋诗《秋日感别》:“已是秋来无限愁,那禁秋里送离舟。欲将满眼汪洋泪,并入湘江一流流。”

家庭变故,民族危机,时代激荡,致使秋瑾思想发生急剧变化。1904年6月22日,秋瑾东渡日本,寻求革命的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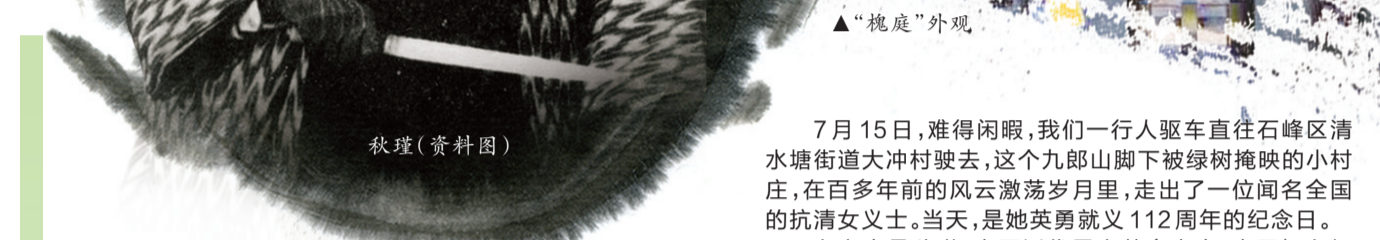
魂归“槐庭”励后人

1904年至1905年,秋瑾先后两次赴日留学。秋瑾在日本参加的第一个革命团体是“共爱会”,秋瑾改名“实行共爱会”,以“拯救二万万之女子,复其固有之特权”为宗旨。秋瑾还开始写作弹词体小说《精卫石》,实际上是其自传,控诉数千年流传下来重男轻女的恶习、封建包办婚姻对妇女的摧残及在封建制度压迫下妇女血泪斑斑的一生。王时泽在《回忆秋瑾》一书中记述,秋瑾“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

秋瑾还先后加入孙中山在日本组织的秘密反清团体“三合会”,以及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举为同盟会本部评议员及浙江主盟人。她还参与成立“演说练习会”,创办《白话报》。

1906年,秋瑾回国,在上海创办中国公学,并在浙江浔溪女校发展教务徐自华及学生徐双韵等加入同盟会。同年秋冬间,为筹措创办《中国女报》经费,秋瑾回到“槐庭”,获得王家一笔经费,并和家人诀别,声明脱离家庭关系,其实是秋瑾“自立革命后,恐株连家庭”。

1907年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后,秋瑾被捕。7月15日凌晨,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时年三十岁。就义前,她愤然提笔疾书“秋风秋雨愁煞人”。孙中山闻讯,悲痛题赠“巾帼英雄”。



▲“槐庭”外观



▲秋瑾故居内复原的秋瑾婚房



秋瑾故居内复原的秋瑾书房

文化快评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偶像文化

贾磊

通过选秀的方式,将普通人变成明星,这是最常见的造星综艺形式。过去十多年,中国的造星综艺经历了技术层面上的不断革新,粉丝投票的方式从短信变为微信投票,舞美也融合了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在流水线般的“造星”模式下,催生了一批又一批“人造明星”。很多青少年把这些“明星”当作崇拜的偶像,穿衣戴帽、举手投足、言谈举止,处处模仿后者。

偶像文化如火箭般蹿起,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偶像是社会风气的指向标,其背后隐藏的是社会价值取向。那种主打“颜值”“炒作”“绯闻”“拜金”的偶像加工手法,很容易将观众尤其是青少年带偏,让价值观尚未成型的他们深受其害。一些青少年,为了追随自己的偶像而应援、打榜,耗费了时间金钱,荒废了学业人生,偶像原本的正向示范意义完全无从谈起。

当然,偶像文化也不是洪水猛兽,对待偶像文化,我们也不宜一味地制造焦虑、宣泄偏见。非理性的偶像崇拜会严重影响青少年的发展,而引导青少年理性对待偶像,可以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因此,建立健康积极的偶像文化氛围,应该是当下社会的迫切需要。

偶像大都是媒体包装和塑造出来的。大众传媒为什么样的人提供舞台,制作什么样的节目,其实就是在推什么样的偶像、传播什么样的价值取向。有的节目,让嘉宾在舞台上肆意炫富、卖丑;也有一些节目,将镜头对准大青少年身边的榜样。媒体不同的选择,会塑造出不同的偶像,进而对社会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我们需要的当然是能提供正向示范的偶像。比如,央视的《中国诗词大会》让当时的中学生武亦姝刷爆了朋友圈,同时也引发青少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捧。浙江卫视《少年国学派》中的李国仕,让观众看到了“活”起来的国学,向人们展示了少年可期。

偶像是粉丝的榜样,是粉丝想要成为的样子。粉丝喜欢自己的偶像,就会在偶像的身上寻找前行的力量。现实生活中,有许多没有站在聚光灯下,却依然勇敢拼搏的人。当他们成为社会的偶像,偶像和粉丝才能真正携手前行,共同成长。我们希望更多综艺节目能够将目光投向那些普通却不平凡的偶像,多讲述一些他们的故事,多彰显一下他们的激情,无数个他们,就会汇聚成引导青少年向上、向善、向前的巨大力量。